

研究宋明理學的新思考[§]

蔡仁厚*

摘要：

壹、緒言：世界史的檢視-----人類理性的放光

貳、學術心量的開擴

一、從反省中突顯新的思考

二、當代新儒的學術態度

三、義理系統之新判（三系）

參、文化意識的深廣化

一、道德意識與文化意識

二、新外王的開顯

三、尊德性而不貶氣性

肆、生活實踐—心靈凝聚，精神開放

一、尊崇經典

二、看重人品

三、重開教化

甲、朱子當初的著力點

乙、當代新儒的省思

伍、歸趨：發揮「推愛」，完成大我的全幅價值

關鍵字：宋明理學、心性三系、辨佛老、新外王、推愛。

[§]本文送審日期為 93 年 2 月 10 日；接受刊登日期為 93 年 4 月 30 日。

* 本文作者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。

研究宋明理學的新思考

蔡仁厚

壹、緒言：世界史的檢視——人類理性的放光

從十一至十六世紀這六百年間的世界思潮，無論佛教系統、印度教系統、回教系統或基督教系統都只停在維持的狀態，缺少鮮活之氣，更說不上有什麼創發性的表現，唯一的例外，是中國儒家的復興。從北宋、南宋到元代、明代這六百年間的學術思想，自以理學（心性之學）為主潮。理學家們在傳統六經（五經）之外，又突顯出「論語、孟子、中庸、易傳、大學」這五部新經典，重新光復了聖人的大道，使中華民族的文化大統得以承續而光暢。在中世紀人類理性進入長期停滯、閉塞；人類生命進入暴亂、狂飆，人類世界陷於動盪不安、悲苦無明的時候；唯獨孔子的德慧在東亞（中、韓、日）重新昭顯，為人類理性生命獨顯光輝。所以，宋明理學乃是十一世紀至十六世紀人類世界的真正肖子。

於此，我們可以從三個視角，來作省察和評判。第一、從對治佛教的態度，可以看出宋明理學家恢弘的世界情懷和高貴的和平精神。第二、從講學論道，可以看出理學家對思想開放和學術自由的真誠實踐。第三、從文教藝能之美，可以看出理學家所表現的文化意識和教化功能。（請參閱拙著《孔子的生命境界：儒學的反省與開展》卷下〈宋明理學與當時的世界思潮〉頁二七二至二七四。）

但滿清三百年中，民族生命受到挫折，文化生命受到歪曲，乃造成中國文化的封閉、停滯、僵化。十八世紀以來，歐西文化上升，中國文化下降，一升一降，乃使文化差距越來越大。進到二十世紀，辛亥革命又未能完成政治建國和文化建國的使命。於是，五四救國運動迅速轉化為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。當時的人認為，要科學，要民主，就必須拋棄傳統而全盤西化。在此思想混亂之際，馬列共產主義乘虛而入，終於造成中國大陸的滔滔紅禍。幸而中華文化的根基畢竟廣大深厚，在經歷了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「文革暴亂」之後，仍然能夠浴火重生，而開顯當代的新儒學（見下文），這真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大奇蹟。

貳、學術心量的開擴

一、從反省中突顯新的思考

文化是一條生命之流，在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，都不免在正面的成就之外，還會發生一些偏差。對於宋明理學，我們可以提出五點省思：

1. 宋明理學排斥佛老嗎？
2. 宋明理學貶斥荀子嗎？
3. 宋明理學忽視經世嗎？

4. 宋明理學輕忽知識嗎？

5. 宋明理學抹煞才性、貶視氣性嗎？

這五點問話，看來並不難回答。但要講得相應中肯，卻也很不容易。譬如第一個問題，你可以用現成的「關佛老」三個字做答案，這是無庸置疑的，但理學家為什麼要關佛老？他們關佛老的什麼？這就不容易言之中肯了。簡而言之，理學家是站在道統（民族文化之統）的立場，為顯立孔子的主流地位而關佛老。佛老有很高的智慧，佛學和玄學都是高級的系統，但理學家持守儒家的生生之道（仁道），不贊成以道家的「無為」或佛家的「緣起性空」作為人文價值世界的主綱。這是基本的分水嶺。

至於第二個問題貶斥荀子，是因為荀子言性惡，本源不透，這個評斷是對的。但因為講性惡而全面抹煞荀學的價值，便失之偏頗了。第三個問題，質疑理學家忽視經世，此卻是誤解。基本上理學家都以天下為己任，而經世之學應以內聖之道為本，他們持守「本立而道生」的原則，不曾積極地講論經世之學，這只是牟先生所謂「內聖強而外王弱」，並非有意忽視外王經世。至於第四個問題，說理學家輕忽知識，那只是現代人的觀點，是與西學對照出來的觀感。儒家之學是生命的學問（與希臘傳統的知識之學之性質不同），而理學家更向內收斂於心性，他們講學的重點不在知識的問題上，所以自然而然地對知識採取消極的態度。但理學家決不「反智」，更不是排斥知識。如果他們處於二十世紀，當然也會順時代與社會的現實，而正視知識，而且如同當代新儒家一樣，會去思考如何從儒家學術中疏導出開顯知識的途徑。最後第五，是才性氣性的問題。

「性」有三個層面，一是德性，二是知性，三是感性。這是我們現在的講法。

在中國哲學史上，首先是孟子反對告子的「生之謂性」。從自然生命看人性，只有「生物本能、生理慾望、心理情緒」三串，這裡看不到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」的仁義之性。為了道德實踐，孟子提出人禽之辯，肯定人有仁義禮智而講性善（本善之性指德性、理性）。到漢代，出現「才性、氣性」觀念。氣性中涵有清濁厚薄的氣稟，與剛柔緩急的氣質，才性中涵有材質、資質、才能之異，與智愚賢不肖之分。宋儒合氣性才性而名之為「氣質之性」，氣質有偏有雜，站在成德的立場，當然要變化氣質之性，使之中正而不偏，純一而不雜。理學家是道德的進路，道德實踐的勁道，是用於正面的存心養性、盡心盡性上，對於氣性才性，便只是消極地施以變化、調適之功夫。如有人因此便說理學家「抹煞」氣性與才性，當然是不相應不中肯的說法，不只是過甚其詞而已。

二、當代新儒的學術態度

當代新儒家既對宋明理學有所承續，自然要接下他們的問題，此節先就傳統學術作一說明。

1. 理學家關佛老，當代新儒家則「辨佛老而不關佛老」。因為第一，道統歸儒家，已屬定論，不必再為爭道統而關佛老。第二、佛家「空」的智慧與道家「無」的智慧，皆是高級的系統，儒家可以承認肯定而進行客觀的研究，但佛老之道，終不同於儒，故儒家不能加以採取。第三、三教合一雖有所不能，但「和而不同」（雖不同而能和）卻正是孔子的教言。據此三點，故當代新儒家對佛老持「辨而不關」的態度。

2. 理學家弘揚孔孟而貶斥荀子，是道的立場。荀子之言天言性，皆與儒家主流不合，但

他以智識心，論解蔽正名，論禮義之統以及天生人成，化性起偽之言，也自成系統，不宜拒斥。故當代新儒家既講孔孟、亦講荀子。

3.宋明理學是心性之學，是成德之教。依心性義理的脈絡而分，當有三系（見下節）。傳統的講法是二系（程朱系、陸王系），而二系之中，尊程朱而抑陸王，此不應理。故當代新儒家，既講程朱，亦講陸王，並依據心性義理的間架，分判理學為三系。

三、義理系統之新判（三系）

分理學為程朱、陸王二系，並不能盡學術之實與義理之全。（1）平常所謂「程朱」，實指伊川與朱子，而明道變成無足輕重，此大不可。此其一。（2）明道即心即性即天（理），其學可講性即理，也可講心即理，而伊川朱子則不能講心即理。將明道與伊川朱子合為一系，義理上有刺謬。此其二。（3）胡五峰之湖湘學，實承北宋前三家（周子、張子、大程）而發展，乃屬北宋儒學之嫡系；其「盡心成性」、「以心著性」之義理間架，有本質上的必然性與重要性，故明末劉蕺山雖與五峰時隔四五百年，而猶然呼應「以心著性」之義。據此，理學分系一事，義當如此判定：

1.北宋前三家，濂溪、橫渠、明道為一組。此時未分系。

2.以下，伊川朱子為一系（心性為二：性即理，心屬氣）；象山陽明為一系（心性是一：性即理，心乃實體性的道德本心，亦是理）；五峰蕺山為一系（以心著性：心與性乃形著關係）。

3.象山陽明系與五峰蕺山系，到究極處仍可合為一大系。此一大系所講之道體、性體乃「即存有即活動」者，其功夫為「逆覺體證」。而伊川朱子所體會之道體、性體則「只是理」，是「只存有而不活動」者（不活動，意謂不能妙運氣化而生生不息），其功夫為「順取的路」（順心知之明，認知攝取事物之理）。（關於理學三系之衡定，請參閱拙作〈牟先生研究宋明理學過程之探析〉（收入《孔子的生命境界：儒學的反思與開展》（學生書局版）頁277~291。）

參、文化意識的深廣化

一、道德意識與文化意識

儒家是道德的進路，所以自孔孟以來，歷代儒者皆重義利之辨。西漢董仲舒有二句話，最能顯示道德意識：

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

正其義（誼），明其道，是正面意思。不謀其利，不計其功，是告誡之詞，並非排斥利與功。蓋立身行事，必須從正面著力，而不應謀求一己的私利、計較眼前的近功。在儒者看來，未有義正而不利者，未有道明而無功者。義正即是利，而且是公利，是國家社會之利。道明即是功，而且是大功，是惠及久遠之功。十一年前，我為「海峽兩岸首屆儒學會議」寫一篇論文，題目就是「道德上的義利之辨與經濟上的義利雙成」。「義利雙成」，可能嗎？我的回答是，在經濟企業上說，當然可能。

自孔子以下，傳統儒家的代表人物從未有人排斥經濟上的正當得利。而道德價值的成就，原本就有主觀客觀兩方面，主觀面是「成己」，也即前人所謂「做聖賢」。客觀面是「成物」，也即成就各種事業上的「善」（道、義、功、利，都含在內）。工商企業方面

的「器能之士」（專技專家），他們成就的善行善事（善行善事之中自有善德），比起「道德之士」來，不但在「量」上無有少欠，「質」上也未必遜色。為期道德心性更鮮活、更充實、更開擴，主觀面的自修自立，雖然仍須重視「義利之辨」，而客觀面的淑世濟民（政法工商農醫……），就當然必須「義利變成」了。

由此可知，儒家的道德意識也必須有所開擴，事實上，一切文化價值都涵有道德的善。因此，我曾用下面這句話來顯示文化意識的具體意涵。

不忍「家國天下淪亡、歷史文化斷滅」，而思有以「保存之、繼述之、光大之」的仁心悲懷，是之謂「文化意識」。

二、新外王的開顯

文化意識，必須通貫內聖與外王，而儒學的基本綱領，也正是「以內聖為本質，以外王表功能。」不過，傳統儒家由內聖通外王的方式，是直接的：以仁心行仁政。仁政王道雖然很好，但現實上那能每個世代都有聖王呢？二千年來，儒家對付處於權力核心的君王，一直欠缺權力制衡的設計，所以有關「改朝換代、治亂相循；君位繼承、骨肉相殘；宰相地位，受制於君」的情形，始終不能得到體制上的解決。而近世西方發展而成的民主政治的體制，卻正可消解中國傳統政治的困局。

依當代新儒家的衡量，儒家的外王學必須有新的充實與開擴。昔時的外王只通向政治（治道一面），現在則必須由治道開顯政道，使政權的移轉有客觀的軌道可以遵循；而民主政治的架構（體制），正是這個客觀的軌道（政道）。政治之外，還有知識一面，儒家經典中本有「開物成務」（易傳）、「利用厚生」（書經）的古訓，這二句聖訓的充分實踐，非「科學、民主」不為功。所以，經濟企業上的實用性的科技，和規範權利義務的客觀法制，都必須融攝進來而成為儒家新外王的主幹。

這一步新外王的開顯，正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所在，而一直困擾儒家的所謂「事功精神」，也可以在此得到落實的解答。

三、尊德性而不貶氣性

中庸有言：「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。」尊德性的「尊」，是尊顯、尊立、顯立之意。道問學的「道」，由也，猶言經由、通過。這句話的本意，是說君子應先尊顯德性主體以立其大，而又經由問學功夫以培養知能。這原本是德智（仁智）兼備的意思。可是由於朱子的誤導，以為自子思以來，教人之法原有二路，一路是尊德性，一路是道問學。同時還點出陸象山是尊德性，自己則偏於道問學，因而想要「去兩短，合兩長」。可是，朱子這番好意（不恰當的好意）到陸象山那裡就碰了壁（因為象山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短要去，也似乎不認為朱子那裡有什麼長可以合。）從此以後，天下學者紛紛擾擾，都在「尊德性」和「道問學」上做文章，其實這是很無謂的。（二年前，我出席江西、福建二處朱子逝世八百年之學術會議，其中一文討論「朱陸異同與象山實學」，編入拙作《哲學史與儒學論評》（學生書局）頁 220-238，文中曾對「尊德性」與「道問學」有所論評，可參閱。）

於此，我只指出，理學家重視道德實踐，當然要「尊德性」。而「氣性」一面不能作

為道德實踐的依據，而且往往成為道德實踐的麻煩，所以有「變化氣質」一類的要求，但這只是儒家道德進路形成的探釋，並非全面排斥氣性。如果擴大文化的視野，在「尊顯德性以成善成德」之外，也同時肯定「才藝之美、情用之真、器能之利」，則文學藝術、音樂戲劇、雕刻繪畫，乃至武術功夫……皆是文化價值的內容，而各有可觀可賞之處。於是「表現才性的光采」、「發揮氣性的功能」，也可與「完成德性的價值」相提並論。而同時肯定而且完成「德性、知性、感性」三個層次的生命意義，豈不正是人文世界的富麗光暢！

肆、生活實踐—心靈凝聚，精神開放

「心靈要凝聚，精神要開放」，這是任何人都該信持的道理。人在生活上的實踐，雖有不同的內容和情態，也有不同的想望和目的。但下列三點，則正是凝聚心靈，開顯精神的落實之地。

一、尊崇經典

世界上每一個文化系統都尊崇經教。各大宗教的信徒，或誦經、或念經、或講經、或讀經、或查經；對於經，主要是尊崇、信持、實踐，而理解或通經義，反倒成為其次的事。而哲學系統或思想系統，則特重知慮思辯、論證推理，而踐行、信守則可能並非切關緊要。哲學是爲了思想，經教是爲了文化。

朱自清是散文名家，曾編寫過一本《經典常談》，在序文裡他說了一句話：我們讀經，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用，而是爲了文化。這句話很普通，但卻是非常通情達理的信實之言。經典裡的常理常道，既不是特殊的知識，也不是專門的技術，直接地看，它並沒有什麼具體的功用，但在人文教化上，經典是先民智慧的結晶，是民族靈魂的泉源。一個沒有經典的民族，它的生命是龐雜的、貧薄的、枯澀的。反之，一個有經典可供尊崇的民族，卻是何等的福命超勝、恩澤綿長啊！

二、看重人品

人品，是一個非常懿美的詞語。人能成爲一個人品，便是人生的不朽。陸象山說：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人居其間，須視做得人，方不枉了。」又說：「今人略有些氣焰者，多只是附物，原非自立也，若某則不識一字，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。」科名、知識、權爵、富貴，皆是物。「附物」者只是依他力，只是氣焰薰炙。世上唯有真能「立志」（志於道、志於仁）的人，才真能持守自立，才有堂堂地做個人的精神氣概。

儒家講學問，都要歸到人身上。一個不成人品的人，是不足以言學問的。象山有云：「諸處方譏然談學問時，吾在此，多與諸生說人品。」人品是自足的價值，有如孟子所謂「仁義忠信、樂善不倦」的「天爵」以及「人人有貴於己者」的「良貴」。每一個人都有「天爵、良貴」（本善之性），這是品行的根基，必須存之養之，擴之充之，以光大自己的生命，完成自己的人品。

一個看重人品的社會，必能崇禮尚義，必不趨炎附勢。傳統民間很看重所謂「讀書人」，因為讀書人明道理，有人品。數千年來，儒家護持倫常教化，所謂禮樂薰陶，人文化成，這份成就，其實是非凡的。可惜近百年來，在西方強勢文明的衝擊之下，人不像樣，行不成款，反倒是日本韓國古風猶存。還能像個樣子，這是中土華裔應該痛切省悟的。

三、重開教化

教化，通常都歸屬為宗教的義務，而一般的學派無須擔負教化的責任，但儒家不只是一個學派，它亦是一個教。因為中國文化不走宗教的路，所以中華民族的教化責任，必須儒家來擔負。在此，我們願意多費一點篇幅採取古今對比來進行省思，看看教化的內容和形式，會有一些什麼樣的今昔異同。

甲、朱子當初的著力點

1. 在日常教學上——落實書院講學

朱子一生，為官之日短，講學之時長。而講學的場所，基本上都在書院。福建學者方彥壽所著《朱子書院門人考》，登錄和朱子相關的書院總共有六十七所。其中（1）朱子創建的有四所：寒泉精舍、雲谷晦庵草堂、武夷精舍、考亭書院。（2）朱子復修的有三所：白鹿洞書院、岳麓書院、湘西精舍。（3）朱子讀書的書院六所：如南溪書院、屏山書院等。（4）朱子講學的書院二十所：如瑞樟書院、濂溪書院、東山書院、懷玉書院，藍田書院，螺峰書院等。（5）朱子講學之地後人所建之書院二十一所：如紫陽書院、晦庵書院、鵝湖書院、包山書院、五峰書院等（6）朱子題詩的書院七所：如鄴侯書院、石鼓書院等。（7）朱子題額的書院六所：如台溪書院、龍江書院等。

朱子在各處書院短期講學論道之時，前來從學的學生，無法確切統計，單就從學於朱子自己所創建的書院之弟子，據方書的登錄，寒泉精舍創建前後的弟子有二十二人。武夷精舍創建前後的弟子有九十一人。考亭書院創建前後的弟子有一六三人。（雲谷晦庵草堂，只三間屋，主要是著述論學之所，經常相從者，大率三五個人）

據以上簡單的記述，朱子書院講學的規模與盛況，已可想像而知。

2. 在經典教育上——確立四書五經

儒家傳承的經典，是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春秋，稱「五經」。禮衍為三（儀禮、禮記、周禮），春秋有三傳（公羊、穀梁、左傳），加上詩、書、易，稱「九經」。後又加爾雅、孝經、論語、孟子，為「十三經」。這是朝廷功令，屬官學系統。而民間講學，可以自由發展。因此，朱子在五經之外，建立孔子以下的道統系列。他為「論語、孟子」作集註，為「大學、中庸」做章句，合起來稱為「四子書」，簡稱「四書」。

朱子權威建立之後，朝廷的科舉考試即以四書五經為典據。其中四書固然採用朱子的集註，五經的本子亦都是朱子學：詩用朱子的「詩經集傳」，易用朱子的「周易本義」，書用朱子弟子蔡九峰的「書經集傳」，禮用朱子後學元儒陳澧的「禮記集說」，春秋則是原三傳（有時加上胡安國的春秋傳）。如此一來，四書五經的經典教育，全歸朱子一系。其影響至今猶存。

3.在生活禮儀上——凝成朱子家禮

作為經典的三禮，既是國家的典章制度，也是家庭生活社會教化的禮儀規範。但那太典實、太古雅，未必完全通用於民間。朱子教學義理，亦重倫常教化，他門下的弟子與再傳後學，深受影響，於是逐漸將婚、喪、喜、慶以及親朋相與往還的各種禮儀，分類編輯成冊，而特名之為《朱子家禮》。由於朱子的聲名，文公家禮不但行於中土南北，而且延及韓國、日本與南洋華人世界。直到今天，雖已散佚、式微，但民間的婚喪之禮，仍然視為準據。

4.在人文景觀上——處處顯示儒家教化的影響

儒家的教化，除了書院講學、家廟祭拜、祠宇奉祀，還有碑碣牌坊、亭台樓閣、摩崖石刻、題榜畫像……皆顯示禮樂倫常、人文化成的風教。再加上道家的道觀，佛家的寺院，更顯出三教相輔相成的景象。朱子是理學家中最關切人文景觀的，他在閩、浙、湘、贛等地留下的行蹤遺跡，宛若處處都是朱子的身影和教化。

乙、當代新儒的省思

二十世紀的儒學，雖經五四與文革的摧抑破壞，而仍能歷劫重生，不愧是華族壓不死的靈魂。目前在教化層上最應深切省思的，是下列五點。

1.生活規矩與婚喪喜慶之禮的改善

據我的印象，韓國人、日本人，在與人相見交往之時，都能彬彬有禮。而中國人則太隨意，而已失去生活的規矩了。至於婚喪喜慶之禮，更是零散雜亂，失其體統。有宗教信仰的各自依從他們的教規儀節，非宗教徒則隨俗行事，有的還能保存一些古禮，有的則隨從中西混雜的新方式，有的甚至任由商人擺佈，把莊重的婚喪之禮，弄得惡俗不堪。前些年政府也曾頒布「國民生活須知」與「國民生活禮儀規範」，立意都很好，可惜宣導不力，推行無方，幾乎沒有人理睬，甚可慨歎。

2.慎終追遠的具體表徵

曾子說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孝順父母和追念遠代的祖先，乃是中華民族報本返始的原初實踐，後來擴大為儒家的三祭之禮：祭天地、祭祖先、祭聖賢。天地是宇宙生命的本始，祖先是族類生命的本始，聖賢是文化生命的本始，所以三祭都是報本返始的表徵。

現在我們的住宅，已經沒有傳統的堂屋了，我們的「家」已經沒有祖先的位置。家，空洞化了，不足以安身立命了。然則，如之何則可？我的做法是，在飯廳的板壁上安上「天地聖親師」的神位，配上一副對聯：「天生地養，盛德廣大；聖道師教，親恩綿長。」再擺上一個小香爐，每逢年節或特殊的日子，全家上香行禮。這樣，一家人都可以面對「天地、祖先、聖賢」而感到自己不再是一個孤零零的生命，而是可以和天地相通，和祖先相通，和聖賢相通的一個有廣度、有厚度、有深度、有高度的大生命。這種感發的力量，可以綿綿不盡，使我們受惠無窮。

3.兒童讀經的宣導與落實

這些年來，台北鵝湖社與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的王財貴博士，推行兒童讀經運動，卓著成效。他的做法，方便自然，平實易行。在大大小小的社區（村莊）裡，只要有一二

位媽媽、大姐姐出來作志工，每週選定二小時，聚合七八個、十來個乃至二、三十個小朋友，在一間屋子裡，輕聲誦讀有注音的經典（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中庸、詩經、周易、老子莊子選本、唐詩三百首……）。課本由善心人士或財團法人捐印，免費供兒童使用。平時隨機抽點，由兒童背誦進度中的章節，每月或相關節慶，還可以舉行比賽，給予獎賞。

因為兒童記憶力特強，這時專力背誦，不必講解。就如銀行存款，先且不斷儲蓄，不斷積蓄，日後會用錢時便有錢可用了。兒童讀經是儲蓄聖賢智慧，隨著年歲增長，自能漸次將默誦在心的聖哲話語，應用到生活行為上去。這樣一來，人人都自然而然地成為有經典教養的高品質的國民。不費政府一毛錢，不必借助學校的師資，也不必加蓋教室，就能順適自然、輕而易舉地完成淵懿優雅的經典教育。天下之善事、美事、樂事，孰大於此！

如今，不但台灣地區、港澳地區、南洋華人地區、美加華人社區，以及大陸南北各省區，從大都市到農村，都已普遍掀起兒童讀經的熱潮。看來中華文化的復興運動，要數兒童讀經最為簡易易行，而人文教育的效果，也要數兒童讀經最能綿綿無盡了。

4. 責成政府多設人文基金，重視文化遺產

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，山川河嶽，壯麗雄奇，人文遺跡，遍地皆是。政府應該配合民間，多設人文基金，作為維護人文景觀與人文活動之用。聯合國對於各國各地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之申請，經實地審查後，予以備案註冊，甚至給予經費補助。近年來，大陸積極進行雙遺產的申請事宜，而大有所獲。台灣地區也應積極規劃，蒐集資料，進行申請，無論成功與否，皆可使文化遺產得到適當的維修與重視，以發揮人文薰陶的功能。

5. 人文景觀與人文活動

人文景觀顯示靜態之美，人文活動彰著動態之美。東亞地區的人文景觀本就普遍而豐富，日本韓國維修得很好，中國大陸則慘遭文化大革命之暴亂，受到嚴重破壞。總算還好，近十年來，大陸各地也在加緊修復人文景觀，而到處成立研究中心與管理機構，有了靜態的人文景觀，自然就會出現動態的人文活動。假以時日，人文教養也會逐漸顯出成效。

台灣社會開放，政治民主，經濟繁榮（近年也不景氣了），本可大有利於人文景觀的建設和人文活動的推行，無奈朝野上下，忙於爭逐權利，漫忽人文陶養。媒體工作者又欠缺文化意識，人文素養也甚為薄弱，只知道一窩蜂似的追逐八卦新聞與情色暴力事件，公眾人物與政府官員，大多蒙蔽良知，不講誠信。如果不是社會民間還蘊蓄一股清流，經常有傳統藝能、美術繪畫的展覽，有古詩詞的吟唱與古典歌舞的表演，以及文化學術的研討會、座談會、演講會，還有紀念先賢先哲的各種形式的活動……，如果沒有這些可愛可敬的人士，如果沒有此類養護靈魂的活動，台灣社會便不只是淪於「貪婪之島」而已。

伍、歸趨：發揮「推愛」，完成大我的全幅價值

儒家講「仁愛」，仁愛也可說是「博愛」，但卻不同於墨家無等差的「兼愛」。孔子說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。由己推到人，有先後之序。禮運大同章說「不獨親其親（也要親人之親），不獨子其子（也要子人之子）。」由親其親到親人之親，也同樣有先後之序。孟子說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也是先由吾而後及於人。

這先後之序，便是行愛的差等。

愛是一個行爲，行爲有過程，有順序，它總是推己以及人，推己以及物。所以孟子又說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」「親、仁、愛」其實都是愛，但其中既有先後之序，也實含親疏厚薄之等。儒家是同時兼顧普遍性與差別性的。理上的普遍性與事上的差別性，本屬義理之當然（也是天理之自然）。理貫於事，必須步步落實，步步推廣，理事圓融，通而爲一，而後乃能充盈圓滿而與萬物爲一體。儒家的仁愛，由人類愛推擴到宇宙愛，這才真正是愛的真諦。

儒家之學是「人」學，是「生命的學問」，化小我爲大我，這是儒家的基本旨趣。從一己的「人品、人德」，通到家庭的「人倫」，社會的「人道」，政治的「人本」，再到世界的「人文」。這一步步的推擴，一層層的開顯，都必須由「小我」通到「大我」這個普遍的人格上，才有真實的意義，才有圓滿的價值。我們接續宋明理學來講論儒家的學問，到此，才是正法眼藏。